

意識形態負荷的中醫存廢之爭

• 鄭 丹

「廢止中醫」自從1920年代被提出以來，一直為中國國內醫界、學界，以及政界等社會群體廣泛關注。在近百年的中醫存廢之爭中，一些標誌性事件左右着中醫發展的走向。這些事件作為研究者關注的焦點，是理解中醫自身、理解傳統科學文化，以及其與國家、政黨關係的典型個案。但是，從相關文獻來看，對民國初期「廢止中醫案」的研究最多^①，關於2006年中醫存廢爭論的文章次之^②，而對於「中醫重新受到重視」的新中國初期這一重要時間節點^③，缺乏專門的學術研究。近年來，當事人在一些回憶文章中對有關事件偶有提及^④，卻終不是系統論及。事實上，新中國初期關於中醫存廢的爭論非但沒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分歧不但存在於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也存在於執政黨內部。中央宣傳部憑藉政治權威，在平息存廢爭論、引導「中西醫結合」政策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這場因意識形態而起的爭論，最終還是通過意識形態批判的方式得以解決。

新中國初期關於中醫存廢的爭論不但存在於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也存在於執政黨內部。中央宣傳部憑藉政治權威，在平息存廢爭論、引導「中西醫結合」政策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這場因意識形態而起的爭論，最終還是通過意識形態批判的方式得以解決。

一 爭論緣起

事實上，中西醫問題不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才引起中國共產黨關注的問題。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針對這個問題有過專門論述。在1944年10月30日陝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的講演中，毛澤東提到^⑤：

……在醫藥方面，更是如此。陝甘寧邊區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許多人民還相信巫神。在這種情形之下，僅僅依靠新醫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新醫當然比舊醫高明，但是新醫如果不關心人民的痛苦，不為人民訓練醫

* 本研究基於筆者博士論文〈在自然科學與意識形態之間：中宣部科學處研究〉的一部分。謹以此文紀念導師龔育之先生誕辰八十周年。

生，不聯合邊區現有的一千多個舊醫和舊式獸醫，並幫助他們進步，那就是實際上幫助巫神，實際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統一戰線的原則有兩個：第一個是團結，第二個是批評、教育和改造。在統一戰線中，投降主義是錯誤的，對別人採取排斥和鄙棄態度的宗派主義也是錯誤的。我們的任務是聯合一切可用的舊知識份子、舊藝人、舊醫生，而幫助、感化和改造他們。為了改造，先要團結。只要我們做得恰當，他們是會歡迎我們的幫助的。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十分關注中西醫的發展，通過一系列政策宣示和現實措施對中西醫發展施加影響，以醫治戰爭留給人們的身體和精神創傷，保證城鄉人民必要的健康水準。毛澤東為1950年8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題詞為：「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鬥。」^⑥這段題詞是毛澤東抗戰時期支持中西醫思想的自然延續，為執政黨的中西醫政策定下基調，即支持中醫和西醫並存，共同發揮作用。

在「一邊倒」向蘇聯的大背景下，1950年年中，王斌以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部長的名義在東北第四次衛生會議上作報告——〈在一定的政治經濟基礎上產生一定的醫藥衛生組織形式與思想作風〉，此文刊載在東北人民政府機關刊物《東北衛生》上，並被收入東北人民政府衛生部編的《衛生人員思想學習文件——醫務工作者的道路》。王斌的文章分為三部分：封建社會與封建醫；資本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醫；新民主主義社會東北的衛生組織。

王斌認為中醫和限地醫^⑦「以人民保健與治療所需要的科學知識來衡量，他們都是不合格的，他們只能在農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醫生治療的安慰作用」，認為中醫是「封建醫」，因而應當隨着封建社會的消滅而消滅，認為之所以不「採取打倒他們的方針」，是因為「今天新中國誕生不久，尚來不及培養大批有科學水準與經驗的新醫生去置換」，他還提出要停止中醫招收學徒，進而最終消滅中醫。對於西醫，王斌認為中國的舊有西醫產生於資本主義社會，因此是「資本主義醫」，他們具有「佔有性」、「商品化」、「利潤觀點」、「私有制」、「殖民地性」、「官僚化」、「壟斷與居奇」、「投機」等特徵，應當拋棄。王斌認為只有學習蘇聯醫學才是中國醫學未來發展的正確方向^⑧。王斌「中醫是封建醫，西醫是資本主義醫」的提法，對當時衛生界產生很大影響。賀誠作為衛生部黨組書記、副部長，是衛生部實際權力的掌握者^⑨，他支持王斌並將其提拔為衛生部副部長。此外，他利用衛生部的組織網絡，通過取消中醫行醫資格、強制中

雖然毛澤東對中西醫的政策以「團結」為主，且中醫和西醫同時受到了王斌基於教條認識的指責，但向所謂「蘇聯醫學」學習並不具可操作性，西醫沒有受到太大衝擊。中醫作為「舊勢力舊文化」的代表，成為衛生行政部門的主要整治目標。



中醫診症情況

醫參加西醫培訓班和禁止中醫世代傳承的方式，推行中醫學習西醫、逐漸消滅中醫的做法^⑩。

在社會結構急劇轉型、社會思想急劇變化的環境下，雖然毛澤東對中西醫的政策以「團結」為主，且中醫和西醫同時受到了王斌基於教條認識的指責，但在政策的實際執行過程中，向所謂「蘇聯醫學」學習並不具可操作性，西醫沒有受到太大衝擊。於是，中醫作為「舊勢力舊文化」的代表，成為衛生行政部門的主要整治目標。在政治權威不容挑戰、行政力量空前強大、群眾認識高度統一的時期，這種做法對於中醫來說無異於滅頂之災。決策者和政策執行者對中醫問題認識的差異，以及偏差政策造成的負面現實後果，導致了執政黨內部分歧的產生。

龔育之指出，「舊有醫學」的理論解釋雖有所不足，診斷治療方法亦顯落後，但由於它是以數千年的臨牀經驗為基礎，診斷和治療方法仍有其「正確」、「有價值」與「合理」的一面。關鍵的是，中醫能夠更好地適應當時中國較低水準的醫療條件。

二 中宣部主導黨內批評

衛生部實際掌權者王斌和賀誠的觀點和做法，建立在曲解「團結中西醫」政策的基礎之上，他們將「團結」僅僅視作取消中醫過程中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策略。政務院文委副主任錢俊瑞察覺到了衛生部消滅中醫的做法並上報中央，毛澤東在1953年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撤銷了王斌的衛生部副部長職務^⑪。為彌補王斌和賀誠錯誤思想的負面影響，明確表達執政黨的中西醫發展方針，扭轉中醫受到意識形態歧視和行政力量排擠的局面，執政黨中央隨後在黨的內部發動了對王斌、賀誠的批判，從政策到理論糾正之前的錯誤。組織黨內批判並向全黨闡明政策的任務由當時黨內主管科教文衛事務的最高職能部門中央宣傳部負責，具體任務由部內的科學衛生處承擔。

當時在科學衛生處工作的龔育之奉胡喬木之命，進行實地調查和文獻研究之後，撰寫文章批評王斌、賀誠的觀點和各地忽視排擠中醫的做法。1954年2月出版的《宣傳通訊》上登載了兩篇關於中西醫政策方針的文章，作者都為龔育之，一篇題為〈批判幾種違背團結新舊醫政策的錯誤言論〉^⑫，一篇題為〈加強新舊醫的團結，糾正歧視舊醫的偏向！〉^⑬，兩篇文章口徑一致，區別只在於前者的理論分析色彩更為濃重，後者更為傾向對現實現象進行批駁。這兩篇文章合在一起，從如何對待中醫從業者、中醫存在發展的必要性、中西醫的階級性問題、中醫作為民族文化的價值，以及如何對傳統醫學進行現代科學改造等五個方面，系統闡述了執政黨其時對於發展中醫的態度^⑭。

關於如何對待中醫從業者，文章針對「中醫是封建主義醫」造成的現實後果，批評地方衛生部門的「宗派主義」和「粗暴行為」造成「舊醫」（即中醫從業者）無法維持生計的現象。文章從開國領袖的諸多講話中找到上文提到的1944年毛澤東的論述^⑮，並將其作為依據，論證對中醫從業者的首要態度是「團結」，使其承擔實際工作，保障其經濟收入和政治地位。在團結的基礎上，「有計劃、有步驟地」提高和改造中醫從業者，使其擁有正確的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和「作風」。對於「團結對象」，地方政府顯然不能通過實行政治批判和階級鬥爭的手段予以消滅。

關於中醫存在發展的必要性，這裏的「醫」包含兩層含義：一是醫生，二是醫學。對於衛生部門有組織地剝奪中醫醫生行醫資格，文章指出這種做法不僅影響了三十餘萬「舊醫」的經濟生活和社會政治地位，而且影響了幾萬萬城鄉人民（主要是農民）的健康，這是因為「舊醫」三十餘萬的規模較「新醫」（即西醫從業者）遠為龐大，且廣泛分布在全國的城鎮和農村，剝奪他們的行醫資格，會使農民和一部分城市人口失去醫治疾病的權利。對於「舊有醫學」，文章認為它的理論解釋雖有所不足，診斷治療方法亦顯落後，但由於它是以數千年的臨牀經驗為基礎，診斷和治療方法（如針灸、單方、正骨）仍有其「正確」、「有價值」與「合理」的一面。最為關鍵的是，中醫能夠更好地適應當時中國較低水準的醫療條件。這裏的必要性分析從中國實際出發，而不以蘇聯和「現代」作為發展哪種醫的劃界條件，更為理智和務實。

關於中西醫的階級性問題，文章闡述了對醫學是否具有階級性和醫生群體階級性的認識。對於醫學的階級性，文章論證道，醫學作為一種自然科學，是人類長期和疾病作鬥爭的知識的積累，並經過防治疾病的實踐檢驗，所以具有客觀真理性，包含着對疾病的客觀規律的認識。人類對這種客觀規律的正確認識在醫學發展的過程中被保存下來，並不隨認識產生的社會制度的消滅而消滅。文章進而明確否定關於醫學具有階級性的看法，認為「醫學本身正如其他各部門自然科學一樣，並不是上層建築，它不是某一個基礎的產物，也不隨某一個基礎的滅亡而滅亡」。

對於醫生的階級性，文章認為雖然醫生在資產階級社會曾經是為資本家服務的，但他們本質上是「文化工作者」和「腦力勞動者」，在新中國可以轉變成「為人民服務」。龔育之在文章中大大引用了他剛剛搜集整理完成的《列寧、斯大林論科學技術工作》中列寧對資本主義社會遺留下的專門家的判斷^⑥，駁斥王斌等人關於「醫生與病人的矛盾本質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的觀點^⑦，明確指出「人們的階級成份是按照經濟地位劃分的」。文章警告說，對醫生階級屬性的攻擊，不利於對其進行團結、改造，勢必增加其「作客思想」。

關於中醫作為民族文化的價值，文章認為中醫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以來的民族文化遺產，在保障勞動人民健康方面歷史上一直在發揮作用。雖然中醫中的主觀觀念和陰陽五行理論並不符合現代科學的解釋體系，但中醫的主要內容並不在於此，而在於它對診斷、治療疾病的有效經驗。文章針對「新醫」提出的「三十年消滅中醫」的論調，明確而堅定地表態道：「黨是不能允許舊醫中的寶貴遺產在我們這一輩人手裏被粗暴地消滅掉的。」

基於以上對中醫一分为二的分析，文章提出了用現代科學改造傳統醫學的設想。文章認為，應尊重中醫這份「寶貴遺產」，拋棄其中「不合理的陳腐的東西」，接受其「豐富的有效的經驗」，根據現代科學理論和方法對中醫中的合理因素進行「整理和發揚」，完成對傳統醫學的「科學化」過程，使之「融合在世界醫學之中」，成為世界醫學的一部分。這一設想，既是對中國傳統醫學發展道路的展望，也蘊含着對西醫從業者的要求，成為毛澤東後來支持的「西醫學中醫」運動的先聲^⑧。從另一個角度可以看出，中醫還沒有被作者納入「科學」範疇之內。這在同一期《宣傳通訊》刊登的「問題與解答」欄目中可以得到進一步佐證，「解答

龔育之認為根據現代科學理論和方法對中醫中的合理因素進行「整理和發揚」，完成對傳統醫學的「科學化」過程，使之成為世界醫學的一部分，這既是對中國傳統醫學發展道路的展望，也蘊含着對西醫從業者的要求，成為毛澤東後來支持的「西醫學中醫」運動的先聲。

提出應將中醫改稱「舊醫」，西醫改稱「新醫」，其原因是「新醫」是已經成為科學的現代醫學；「舊醫」是指中國原有流傳已久的醫學，還不是科學，尚待研究和整理，使之成為科學^⑩。

這兩篇文章在當時的醫學發展狀況和國內外政治背景下，顯得尤為清醒而有分寸。文章引用列寧和毛澤東等人的權威言論，以縝密清晰的論述，在執政黨內部為中醫創造了存續和發展的空間。對於中醫如何發展乃至如何走向「科學」這一點，很多人都有不同認識。但在執政黨雄心勃勃地對中國社會進行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的1953年，文章中貫穿的思路是無可指責的。

三 政策轉變遇阻

《宣傳通訊》上這兩篇文章發表後立刻在全國文教宣傳系統引起重大反響。尤其是前一篇〈批判幾種違背團結新舊醫政策的錯誤言論〉，因說理舉證充分、切中要害，在沒有中央明確要求的情況下，被全國各地省級黨刊多次轉載^⑪，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官方文件的指導作用。在糾正衛生系統錯誤路線的過程中，兩篇文章在理論和輿論上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由於中宣部科學衛生處改組為科學處以後仍代管衛生事務直到1956年，這兩篇文章實際上成為中宣部後一時期在衛生領域的指導方針。

中宣部科學處指出，雖然執政黨中央做出改進中醫工作的決定以後，衛生行政部門對過去的錯誤有所反思和糾正，但歧視和排斥中醫的指導思想仍未根本動搖。因而，需要利用公開報刊系統批判王斌的錯誤，揭露其思想實質。

隨後，中宣部試圖通過自身擅長的新聞宣傳為轉變原有錯誤路線做出努力。《宣傳通訊》兩篇文章發表以後，執政黨的文教宣傳部門開始加強對執政黨中醫政策的宣傳，以扭轉以王斌、賀誠觀點為代表的錯誤思想造成的誤導。1954年11月的一期《宣傳通訊》針對各地各部門的宣傳工作專門提出四項注意要點：其一，宣傳目的是使幹部群眾重視中醫遺產，加強中西醫團結，需特別強調西醫學習、研究中醫中藥的重要性，發動組織西醫利用現代科學知識「整理祖國醫學遺產」；其二，對中醫應採取「批判地接受」的態度，還應批評衛生行政部門輕視中醫的政策，以及西醫對待中醫的「宗派主義」態度；其三，應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經過調查研究，不誇大渲染，避免使中醫「神秘化」；其四，除利用已有的報紙、廣播等宣傳工具之外，還應利用座談會等形式發揮進步的中西醫和廣大幹部的宣傳作用^⑫。

除了通過宣傳機構引導中醫問題輿論之外，中宣部還發揮其指導衛生事務的職能，直接針對衛生行政部門制訂政策。中央文委（其負責人主要來自中宣部）黨組於1954年10月26日向執政黨中央作出〈關於改進中醫工作問題的報告〉，提出要在全國展開對王斌等人錯誤思想的批判，改正各級衛生行政部門奉行的歧視中醫的政策。報告於11月中央批示同意後轉發全黨^⑬。從1955年2月起，衛生部機關報《健康報》等報紙開始公開對王斌進行批評^⑭。然而，在多為西醫出身的衛生行政官員中，王斌等歧視中醫的思想仍廣泛存在，僅靠黨內的批評和警示無法達到迫其思想轉變的目標。對於中醫政策的調整和官員思想的轉變，執政黨還需要進一步克服重重阻力。

中宣部科學處在3月指出，雖然執政黨中央做出改進中醫工作的決定以後，衛生行政部門對過去的錯誤有所反思和糾正，但歧視和排斥中醫的指導思想仍未根本動搖。科學處進而批評衛生系統的幹部和醫務工作者對《宣傳通訊》1954年2月兩篇文章的重視嚴重不足。因而，需要利用公開報刊系統批判王斌的錯誤，揭露其思想實質²⁴。

四 公開闡釋中醫政策與批判的深入

為了進一步推動中醫政策的調整和衛生行政官員的認識轉變，中宣部親自組織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為公開批判定調。這篇由龔育之和李佩珊合作完成的文章——〈批判王斌在醫學和衛生工作中的資產階級思想〉，發表在1955年8月的《人民日報》上。文章關於中醫作為民族遺產的價值和中西醫沒有階級性的論證，基本沿用了1954年2月《宣傳通訊》批評文章的思路。同時，在1955年初開始的「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運動背景下，王斌的思想被定性為「資產階級思想」，這篇文章認為王斌錯誤的實質是「宣揚資產階級思想，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反對黨的方針和政策，反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批評王斌否定中醫的理論是「宣揚極端卑鄙、極端惡劣的資產階級宗派主義思想和奴化思想」，批評王斌「西醫是資本主義醫」的觀點是「對文化遺產的虛無主義」態度，批評王斌的「反批評」是「堅持錯誤」，「顛倒黑白」。文章對賀誠雖沒有點名批評，但仍批評衛生部門「某些負責同志」為資產階級思想所支配，奉行與執政黨相違背的方針政策。文章最後號召，無論衛生部門還是科學部門，都應在實際工作中徹底貫徹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產黨的領導²⁵。這篇文章為王斌等人推行的中醫政策在政治上做了定性，並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尖銳指出其「奴化」的一面。作者希望通過「揭示本質」的方式引起醫學界和衛生界對批判王斌的重視，從而促進相關人員思想的深度轉變。

《人民日報》的這篇文章促成了對王斌的新一波批判，《人民日報》和《健康報》又發表了一系列以此為基調的批判文章²⁶。隨着批判的不斷深入，賀誠繼王斌之後受到點名批評，被撤銷衛生部副部長、黨組書記職務。1955年9月，中共中央專門做出〈中央關於賀誠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決定〉將賀誠的錯誤歸結為他對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喪失了警惕，其思想被資產階級思想「佔了優勢」，認為賀誠的錯誤主要在於三個方面：其一，在關於團結中西醫、醫學教育和面向工農兵幹部的方針政策上，和中央有分歧；其二，將衛生工作作為一種單純科學技術工作，拒絕黨對衛生工作的領導，把衛生部門變成「獨立王國」；其三，多次拒絕有關部門對其錯誤的批評糾正。〈決定〉提出，為肅清賀誠的資產階級思想和作風在衛生部門中的嚴重影響，「各級黨委應當領導各級衛生部門和報紙刊物展開對於賀誠同志錯誤思想的批判」，並將這一批判確定為各級衛生部門1955年第四季度的「中心任務」²⁷。

為加強對中央〈決定〉的執行力度，中宣部馬上對下一步工作做出部署，提出要「進一步深入批判醫學和衛生工作中的資產階級思想」²⁸，從而將「衛生部門

在1955年下半年執政黨的表述中，中醫的「非科學性」被弱化，其經過幾千年實踐檢驗的有效性得到強調，「新醫」和「舊醫」的說法悄然消失，昭示着執政黨對中醫態度的轉變，從要求「落後」的中醫向「先進」的西醫學習，轉變成要求西醫向中醫學習。

和一切文教、科學、技術部門置於黨的領導之下^②。在提出工作部署的文章中，中宣部指出，經過對王斌否定和歧視中醫思想的批判，衛生幹部和醫務工作者受到了一次普遍的思想教育，原有局面「基本上扭轉了過來」，但「很多材料」表明，歧視中醫的宗派主義思想並沒有完全清除，團結和學習中醫的政策也時常受到抵制，必須通過報刊文章宣傳和衛生人員思想學習等方式，進一步批判否定和歧視中醫的思想^③。

通過與1954年批評文章的比較可以發現，在1955年下半年執政黨的表述中，中醫的「非科學性」被弱化，其經過幾千年實踐檢驗的有效性得到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和「科學不妨去實踐學習學習」（斯大林語）作為證明中醫具有某種科學性的論據出現在一般行文當中。與此同時，「新醫」和「舊醫」的說法悄然消失，昭示着執政黨對中醫態度的轉變，中西醫結合政策大大轉彎，從要求「落後」的中醫向「先進」的西醫學習，轉變成要求西醫向中醫學習。對本國醫藥文化自信的恢復，既源於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帶來的對西方文明的排斥，也源於新中國初期建設巨大成就的鼓舞。

執政黨面臨的任務包括醫治常年戰爭帶給國家的創傷，為工農業建設提供健康合格的勞動者，這使得他們對待中醫帶有一種實用傾向。雖然中醫當時仍處於「前科學階段」，但其千百年獲得的經驗體系和已成規模的從醫群體，是執政黨為安民興業必須依靠的資源。

五 爭論所負荷的意識形態

1955年11月19日，賀誠在《人民日報》發表自我檢討^④。被撤職的賀誠離開了衛生行政部門，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中醫存廢之爭以執政黨內部支持中醫的力量勝利而告終。

這場爭論區別於民國時期中醫存廢之爭和現今有關爭論的最大特點是，它已經超越了醫學科學和醫療事業的範疇，而上升為意識形態層面的爭執。從表面上看，王斌、賀誠與中宣部表述的意識形態都來自執政黨的同一直言系統，該系統傾向於將思想分成「無產階級的」和「資產階級的」，但這種一致性並不能掩蓋雙方的實質差異：一方將包括醫學在內的自然科學作為人類思想的組成部分看成是有階級性的，另一方則為自然科學在人類思想中尋求獨立的位置，使之免於接受階級分析的考驗。

前一種認識看似荒謬，但在新中國初期並不鮮見，中共黨內激進的革命者要求徹底顛覆傳統，重建新秩序，這就要求搬掉兩座「大山」——不但切斷與帝國主義國家任何意義上的聯繫，而且割斷與中國封建社會傳統的一切承繼關係。在激進派眼裏，「中醫」早已不是一門學問或是一個行業，而是「愚弄」和「毒害」中國人數千年的腐朽文化。在狹隘的政治意識形態視野裏，中醫的理論內涵被看作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其診療效果也被選擇性忽略，中醫完全成為「封建反動文化」的標誌性符號。由此，對於浪漫的革命理想主義者而言，批判中醫成為一種「政治正確」的態度，消滅中醫成為一種「革命進步」的行為。

後一種認識固然有有識之士的堅持，但就其產生的條件環境而言，其實是中共黨內另一種意識形態主導的必然結果。1950到1955年是中國和蘇聯的蜜月期，1953年毛澤東更發出了「在全國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的最高指示^⑤。在這種背景下，執政黨還是堅決叫停了以學習「蘇聯先進醫學」為名改造中醫的口

號和實踐，這種逆向選擇表明即便在中蘇交好的建國之初，跟隨蘇聯也不是完全正確保險的選擇，中國與中醫相關聯的意識形態具有某種特殊性，體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執政黨其時面臨的任務除了用共產主義理論和信念武裝民智、振奮民心之外，更重要的是醫治常年戰爭帶給國家的創傷，為工農業建設提供健康合格的勞動者，這使得執政黨高層對待中醫帶有一種實用傾向。國民生產生活的常態運行需要慣常的力量予以支持，雖然從現代科學觀點看來，中醫當時仍處於「前科學階段」，但其千百年獲得的經驗體系和已成規模的從醫群體，是執政黨為安民興業必須依靠的資源。與狂熱的大躍進相比，建國之初執政黨高層對慣常力量的態度是謙遜而理智的。

並非次要的另外一點是，毛澤東等人不僅是共產主義的信仰者，事實上，正如斯大林認識到的，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也是堅定的「民族主義者」^③。為維護民族國家的根本利益，中共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後來的國共內戰中與蘇共多次發生摩擦，面對中醫存廢之爭時，執政黨自然也受到民族情感的影響。中醫作為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文明遺產，是執政黨在繼承中華文明時必須予以關切的代表性成就，也是執政黨藉以提振民族信心的有力抓手，這種思路對執政黨中醫政策的影響一直延續着。與此相互印證的是，在執政黨的鼓勵推動下，1950到1970年代成為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史研究的活躍時期，對中醫醫理和藥理的現代科學解讀取得了一些進展，部分研究成果引起了國際科學史界的矚目。

中醫的存續使得中國在建國初期低水準條件下為人民群眾提供了基本的醫療服務。當時由中宣部主導表述的中西醫政策成為日後很多政策的依據，甚至是當前一些醫藥制度的雛形。在補充與替代醫學日益受到重視的今天，如何認識中國傳統醫學和西方現代科學的關係，依舊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中醫的存續使得中國在建國初期低水準條件下為人民群眾提供了基本的醫療服務。當時由中宣部主導表述的中西醫政策成為日後很多政策的依據，甚至是當前一些醫藥制度的雛形。

註釋

- ① 其主要者包括李群、錢永全：〈1929年民國中醫廢存風波〉，《檔案與建設》，2009年第3期，頁53-54；郝先中：〈1929年上海醫界圍繞中醫存廢問題的論戰〉，《中醫文獻雜誌》，2006年第4期，頁46-48；鍾義：〈存廢之爭今又起 前車之鑒應牢記——七十多年前捍衛中醫的一場抗爭〉，《中醫藥文化》，2007年第2期，頁10-12；朱曉光：〈國民黨中央內部圍繞「中醫條例」的中醫存廢之爭〉，《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5年第6期，頁52-54；張鳴：〈舊醫，還是中醫？——七十年前的廢止中醫風波〉，《讀書》，2002年第6期，頁136-42；左玉河：〈學理討論，還是生存抗爭——1929年中醫存廢之爭評析〉，《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頁79-92。
- ② 其主要者如鄭國慶、胡臻：〈兩次中醫存廢之爭的比較研究〉，《中華中醫藥學刊》，2008年2月號，頁354-56。
- ③ 編者：〈中醫存廢的百年紛爭〉，《高科技與產業化》，2007年8月，頁56-57。
- ④ 其主要者如龔育之：〈回憶中宣部科學處〉，《中國科技史雜誌》，2007年第3期，頁206-15；呂嘉戈編著：〈挽救中醫：中醫遭遇的制度陷阱和資本陰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3-4。

- ⑤⑩ 毛澤東：〈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載《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011-12。
- ⑥ 這是毛澤東為1950年8月7日至19日衛生部與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衛生部聯合召開會議的題詞。
- ⑦ 在大城市經過短期訓練或在大醫院見習過醫術的西醫，到農村工作，只在當地具有行醫資格的，被稱為「限地醫」。
- ⑧ 王斌：〈在一定的政治經濟基礎上產生一定的醫藥衛生組織形式與思想作風〉，《東北衛生》，1950年第9期，頁5-10。
- ⑨ 當時衛生部部長是馮玉祥夫人李德全。
- ⑩⑪ 賀誠：〈檢查我在衛生工作中的錯誤思想〉，《人民日報》，1955年11月19日。
- ⑫ 呂嘉戈編著：《挽救中醫》，頁3。
- ⑬ 龔育之：〈批判幾種違背團結新舊醫政策的錯誤言論〉，《宣傳通訊》，1954年第6期，頁20-29。
- ⑭ 龔育之：〈加強新舊醫的團結，糾正歧視舊醫的偏向！〉，《宣傳通訊》，1954年第6期，頁30-34。
- ⑮ 以下引文均出自上述兩篇文章，不再分別註明。
- ⑯ 列寧說：「對專門家，我們不應採取吹毛求疵的政策。這些專門家不是剝削者的傭僕，而是文化工作者，他們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曾服務於資產階級，而全世界社會主義者都曾說，這些人在無產階級社會裏是會向我們服務的。」參見龔育之編：《列寧、斯大林論科學技術工作》（北京：科學出版社，1954），頁15。
- ⑰ 此類觀點在王斌的文章中體現最為明顯，可參見王斌：〈在一定的政治經濟基礎上產生一定的醫藥衛生組織形式與思想作風〉。
- ⑱ 1958年，衛生部提出「大力開展西醫學中醫運動」，毛澤東批示：「我國的民族醫學遺產是一個偉大的寶庫，必須組織西醫人員認真學習，繼續努力加以發掘提高。」參見張文康：〈堅定不移地貫徹黨的中醫藥政策，把中醫藥學的繼承與發展推進到一個新階段〉，《中醫藥管理雜誌》，1994年第2期，頁8、10。
- ⑲ 編者：〈問題與解答〉，《宣傳通訊》，1954年第6期，頁34-35。
- ⑳ 何祚庠：〈胡喬木同志與自然科學研究〉，載劉中海、鄭惠、程中原編：《回憶胡喬木》（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頁78。
- ㉑ 編者：〈宣傳工作者注意〉，《宣傳通訊》，1954年第34期，頁27-29。
- ㉒ 中共中央：〈中央對中央文委黨組關於改進中醫工作問題的報告的批示〉，《宣傳通訊》，1954年第38期，頁1-15。
- ㉓ 如朱健：〈批判王斌輕視歧視中醫的資產階級思想〉，《健康報》，1955年2月4日；許德：〈徹底清除王斌歪曲中醫政策的錯誤思想〉，《健康報》，1955年2月25日。
- ㉔ 編者：〈宣傳工作者注意〉，《宣傳通訊》，1955年第7期，頁36-38。
- ㉕ 龔育之、李佩珊：〈批判王斌在醫學和衛生工作中的資產階級思想〉，《人民日報》，1955年8月22日。
- ㉖ 其主要者如任小風：〈批判賀誠同志在對待中醫的政策上的錯誤〉，《人民日報》，1955年12月20日；趙一鳴：〈肅清歧視中醫的錯誤思想〉，《健康報》，1955年9月16日。
- ㉗ 中共中央：《中央關於賀誠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 ㉘⑳ 中央宣傳部：〈進一步深入批判醫學和衛生工作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宣傳通訊》，1955年第27期，頁27-31。
- ㉙ 中央宣傳部：〈衛生部門要抓緊開展批判賀誠思想的工作〉，《宣傳通訊》，1956年第1期，頁35。
- ㉚ 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載《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263-68。
- ㉛ 邢和明：〈毛澤東與鐵托〉，《黨史縱覽》，2004年第11期，頁7。